

韦启良 编著

現代名人母親

臧克家



(修订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现代名人母亲

韦启良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景岚

责任印制：田德润

责任校对：程丽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名人母亲/韦启良编著. -2 版 (修订版).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8

ISBN 7-5041-0710-7

I. 现… II. 韦… III. ①家庭教育-经验②名人-母亲
-生平事迹-中国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098 号

出版发行 教学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2003339

传 真 6201380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2 版

字 数 157 千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 元

印 数 00 001 - 5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母亲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

康友清



目 录

一个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毛泽东的母亲	(1)
男女孩子一视同仁	
——宋庆龄的母亲	(9)
大地	
——周恩来的母亲	(16)
一生劳动 吾党之光	
——朱德的母亲	(22)
志洁行芳 性情刚强	
——邓颖超的母亲	(30)
年纪最大的女留学生	
——蔡和森、蔡畅的母亲	(37)
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	
——夏明翰的母亲	(44)
生为儿女 死为儿女	
——瞿秋白的母亲	(52)
留取中华史上名	
——廖承志的母亲	(60)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马本斋的母亲	(71)

比板子更有权威的慈母泪

——陈独秀的母亲 (76)

她为中国文化献出三个儿子

——鲁迅的母亲 (82)

一个人，一部受难的历史

——郭沫若的母亲 (91)

誓守遗言 管教双雏

——茅盾的母亲 (101)

传给性格的老师

——老舍的母亲 (109)

年轻的寡妇 当家的后母

——胡适的母亲 (115)

人到吞声尚有声

——刘海粟的母亲 (123)

摇篮曲陶冶出战歌

——冼星海母亲 (131)

乐善好施 诚信为怀

——聂耳的母亲 (143)

父子两代名人的背后

——梁思成的母亲 (153)

“要先有学问再革命”

——茅以升的母亲 (159)

祖母做学生，孙儿做先生

——陶行知的母亲 (167)

愚忠是一种力量

——杨振宁的母亲 (175)





为了孩子们才有勇气生活	
——丁玲的母亲.....	(186)
“封建社会的完人”	
——冯友兰的母亲.....	(201)
苦爬力撑一百年	
——田汉的母亲.....	(216)
后记.....	(228)
再版后记.....	(230)



一个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毛泽东的母亲

1919年冬，毛泽东(1893~1976)在长沙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家。但当他到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睡在棺材里面了。丧事完毕，毛泽东在给一个名叫邹蕴真的同学写信，写到他的丧母之悲，写到他的母亲生前的为人，其中有这样的话：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则是这最后一种人。这几句话，显示了毛泽东在很年轻的时候，对于林林总总的世相人生，已经有了宏阔而又细微的观察，而且对他的母亲这样的劳动妇女的品德的评价，达到了极其尊崇的地步。

毛泽东的母亲文其美(1867~1919)，生于湖南湘乡县四都乡一个叫做唐家坨的小村庄。她的家，自然是一个相当贫寒的农户，要不然她也不至于在13岁的时候，就嫁到湘潭县韶山冲毛家做童养媳。“文其美”这个名字，大概最早见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那本书里，斯诺记下了毛泽东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对记者的谈话，其中有一句：“我的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近几年，有人考证出来，“文其美”是“文七妹”的误译。据说，毛泽东的母亲在娘家并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是家人根据排行呼为“七妹”。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的

名人

母亲

时候，讲的是“文七妹”，斯诺用英文记下了这个音，后来中译者又根据英文记音，误译成“文其美”了。这种考证，看来是很符合情理的。因为旧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大多没有读过书，也就没有正式的学名，只有很通俗的乳名而已。但是，看过《西行漫记》的人，不难发现上述考证是有漏洞的。因为斯诺明明说过，他访问毛泽东的时候，是由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年轻共产党员吴亮平担任翻译的；毛泽东用柔和的湖南方言讲述，吴亮平口译成英语，斯诺用英文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由吴译成中文，交给毛泽东改正。再说，《西行漫记》自1938年由上海“复社”出版中译本以来，在中国的再版本、翻印本很多，毛泽东不可能没有看过。因此可以说，“文其美”的名字，至少是得到毛泽东的认可。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的母亲在娘家确实叫做“文七妹”，那么，她嫁到颇有声望的毛家以后，也不无可能给她一个更像名字的名字。总之，“误译”云云，虽可聊备一说，但并不怎样值得重视。

前面已经说过，文其美13岁做童养媳。到了18岁她才与丈夫毛顺生(1870~1920)“园房”，即正式结婚。毛顺生比她小三岁。按照“女大三，抱金砖”的民间说法，这是很理想的婚配。婚后不久，毛顺生出去当了两年兵。当兵的经历，扩展了他的眼界。回家以后，他除了种田以外，还做些小生意，慢慢积攒起家业，有了20多亩田地，每年可以有四、五十担谷子的剩余。但是，这个家也有很不足的地方，就是媳妇文其美先后生育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1893年，文其美生了第三胎，又是个儿子，按





照族谱的排列，这是“泽”字辈^(注)，取名“泽东”，字“润之”。这个“三伢子”的出世和健康长成，对毛顺生一家，无疑是极大的喜庆。尤其是文其美，她已经经历了两次失子之痛，为了保住这个第三个儿子，她觉得光靠自己的精心抚育，还是难保无虞的。于是，她转而祈求神灵的保佑，从此便笃信佛教，行善积德。亲戚邻里有人有困难的，她常常背着丈夫给予尽可能资助。她的损己利人的行为，一般是只瞒着丈夫而不瞒儿子。幼小的毛泽东觉得母亲是做得对的。母亲的乐善好施，由耳濡目染而渐入儿子幼小的心灵。毛泽东读私塾的时候，开头都是回家吃午饭的，后来他向母亲提出要带午饭到私塾里去。母亲以为儿子可能是为了减省往返之劳，不浪费读书的时间，因而也就同意了。过了几天，她发现儿子每次带的午饭都比较多，而晚上下学回来还显得肚子很饿的样子。她怕是儿子得了什么怪病，便过细盘问，这才了解真情：原来私塾里来了个叫做黑皮伢子的新学生，家里穷，每天都没有午饭吃，毛泽东就想到自己带午饭去，好和黑皮伢子两个人匀着吃。母亲知道原委以后，不但没有责备儿子，反而告诉儿子，以后要带够两个人的午饭，免得两个人都半饥半饱。母亲的这些言行品性，影响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是显而易见的。

与对母亲的爱戴、崇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父亲의思想和性情却十分反感。毛顺生由小本生意而逐渐

注：按1737年(清乾隆二年)修的《毛氏族谱》定的二十代子孙族谱是“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毛泽东之父毛顺生谱名“毛贻昌”；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政坛上曾有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毛远新，那是毛泽东的侄子。

发家，就一面购置田地，一面从事贩运、出售谷物的更大的生意。重利轻义的商人意识，使他不赞成妻子的“博爱”精神，甚至在荒年也不允许妻子施舍一些饭食给前来讨饭的人。对于妻子儿女，他也常常苛刻得不近情理。他每月十五日给雇工们加一次菜，就是煮一些禽蛋下饭，可是这样一顿有炒蛋的菜，妻儿们都不能享受，更不用说吃肉了。由此种种，年幼的毛泽东就经常与粗暴的父亲发生公开的冲突。毛泽东 13 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在家里当着许多客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儿子被激怒了，当众与父亲对骂起来，并拔腿离家而去。先是母亲追上来，竭力劝说儿子回去。接着父亲也赶来，命令儿子立即回家。毛泽东就跑到一口池塘边，声言如果父亲再上前向他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水塘里去。父亲果然不再逼近，因为他知道儿子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但是他也不能轻易放下“严父”的面子，他坚持要儿子向他磕头认错。毛泽东看到父亲已经让步，而且又有左右为难的母亲在场，便也提出了一个相应让步的条件，即父亲只要答应不打他，他可以单腿跪下磕个头（正式的磕头是要双腿跪下的）。冲突就这样在双方妥协的情况下结束了。这场冲突的解决，可以看出渐渐长大的毛泽东的性格，既有深受母亲影响的地方——坚决不赞成像父亲那样的不合情理的处事待人的态度，又不完全像母亲那样——不采取在感情上流露厌恶和在行动上公开反抗。

毛泽东的父亲让儿子进私塾读书，而且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他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儿子读书认字以后可以帮他记账，二是读了经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这两个目的，都是很急功近利的，很实用的。记账，毛泽东在进学





校读书不久就会了。至于打官司的事，毛顺生是有过失败的教训的。一次，他为了片山林的权属纠纷与别人打了一场官司，在公堂上，对方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而他自己只是小时候读过两年书，粗识几个大字而已，有理也说不清楚，更不用说引述经书来作辩论了。结果，他败了诉，眼看他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山林，被判给了对方。他感到切肤之痛。因此，他支持儿子读书，希望将来再有官司的时候派上用场。但是毛泽东对经书不感兴趣。他爱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这当然不合父亲的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指责，他常常在深夜把窗遮起，不让父亲看到漏夜读书的灯光。而对于母亲，他则不必瞒着，因为母亲一字不识，不会知道他在读“没有用”的书，而且她对儿子做的事也从来不加干涉，尤其是遇到父亲与儿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她的同情总是在儿子一边。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对斯诺谈到他早年的家庭生活时，曾经作这样的描述：“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到了毛泽东 13 岁的时候，毛顺生认为儿子读了五六年书，记账和打官司都够用了，便让他在家当作一个全劳力使用，白天和雇工一起干活，晚上记账。如此过了两三年。毕竟毛顺生是个半农半商的人，他也希望儿子学会经商。于是他决定让儿子到离家 90 里的湘潭县城，那里有一家和他有生意来往的米店，愿意收他的儿子做学徒。起初，毛泽东准备接受父亲的这一安排，因为他觉得到城里去当学徒也许比在家里做工、记账还有意思一些。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与母亲有关的契机，改变了毛泽东此后的生

活道路。母亲娘家的一个表哥，告诉毛泽东，他们湘乡县办了一所叫做东山学堂的新式学校，采用新法教育，不怎么注重经书，倒是有许多西方“新学”的课程，而且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县，他可以用湘乡籍的名义，报名进入这所学校。这个消息，激起了毛泽东恢复学业的强烈愿望。父亲开头总是反对的，但经不住母亲和外家亲戚的劝说，最后还是同意了，并且给了1400个铜元，作为学费和膳宿费。这样，毛泽东就穿着母亲缝制的一套像样的短衫裤，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求学了。在东山学堂，即使像毛泽东这样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的学生，从穿着上看，也还是土里土气的。因此许多阔学生就看不起他。但是教员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的成绩好，读书多。他在这里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也学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的知识，知道除了至尊至贵的中国皇帝以外，世界上还有华盛顿、彼得大帝、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等数不清的杰出人物。

儿子的进步，自然使母亲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她也有担忧，因为儿子读了新书，便越来越不信佛了。至于父亲，他也有高兴的理由，那就是儿子接受了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但是，毛泽东的胸中，已经有更多的使父母无法了解的东西了。他在东山学堂没有毕业，就请一位教员介绍他到长沙去，进了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不久，辛亥革命发生，他投笔从戎，当了半年兵。退伍以后，他在长沙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化工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以及省立第一中学。这些学校，有的是他去报了名以后不满意而没有参加考试，有的是录取以后觉得不好而不去注册入学，有的是入学一阵以





后又自动退学。有一个时候，他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省立图书馆看书，晚上到湘乡会馆住宿。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个从乡下跑出来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做了多次选择。但是有一个条件制约着他，即父母亲要求他进学校读书，否则将不再供给他费用。他再次做出选择，觉得自己似乎还是适合教书，于是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按照学制的要求，修满了五年，完成了他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只是他的这一人生选择不是最后的。毕业以后，他没有做几天教师，就走上了布满荆棘、壮阔辉煌的现代革命斗争的漫长道路。

在漫长的战士与领袖的道路上，母亲的高风亮节，时时在毛泽东的忆念之中。1919年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盖。”作为这一“博爱”精神的注脚，便是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到的这样几句话：“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了30多年的故乡小憩。在故居母亲的遗像前，他端详良久之后说：我像母亲。是的，他像母亲。不仅圆而丰硕的脸盘像，而且基本品格也像。他把母亲的“博爱”，升华为为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伟大理想和实践。

除毛泽东以外，文其美这位平凡的母亲还为中国革命抚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毛泽民(1896~1943)、毛泽覃(1905~1935)、毛泽健(养女)。这三个儿女都牺牲于创建新中国的事业之中。

【附】主要资料来源

- (1)(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见《斯诺文集》第二卷，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
- (2)余世诚：《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人物》杂志 1985 年第三期；
- (3)晓蔚：《毛泽东家世、童年纪略》，《中华英烈》杂志 1989 年第五期；
- (4)方舟、章益：《中国现代名人珍闻轶事》，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 9 月版。





男女孩子一视同仁

——宋庆龄的母亲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一般的公共场所，都悬挂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的两边，写的是孙先生的两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遗言起初也许不是作为联语而说的。但后人把它用作联语，看起来也就很像一副对联了。你看，它字数整齐，词语对仗还算工稳，含义新颖深刻；平仄上虽不甚讲究，但未尝不能说是一种突破。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恶作剧者把这副名联篡改了，叫做“宋家还有一女，同志仍须努力”。这恶作剧如同一则政治笑话，竟也口耳相传，不胫而走。那意思好象是说：宋家的大女儿宋霭龄（1890~1973），嫁给了豪门之子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1893~1981），嫁给了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三女儿宋美龄（1897~ ），嫁给了一代军事、政治强人蒋介石；还有一女儿待字闺中，看哪个“同志”做得这个乘龙快婿。谁都听得出来，这篡改了的联语，是深含讽刺意味的。但那讽刺的对象，绝不是孙中山先生，而是那些自命为孙先生的信徒，实际上是奉行“天下为私”而把民族、民权、民生置诸脑后的不肖者们。对那些不肖者们，投以一点辛辣的嘲讽，也是应该的。不过，从信史的角度看，“宋家还有一女”是不确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确实有个显赫的宋家。宋家之所以显赫一时，主要是因为这个家庭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女儿自己，也各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施与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宋庆龄，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她一直坚持捍卫和发扬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和精神，为新中国而奋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身分而终其一生。她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恐怕不在世界上任何杰出妇女人物之下。在男尊女卑传统极其悠远绵长的旧中国，能够把一家三个女儿都养成非凡人物，这自然会引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长久瞩目。可是对于宋庆龄及其姐妹的家庭环境和早期教育，传记作家们更多地注意她们的父亲宋嘉树(1866~1918)，而提到她们的母亲倪桂珍(1869~1931)时，则往往语焉不详。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她的父亲倪一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年轻的时候就移居上海，在一个姓徐的人家任家庭教师，后来就和徐家的女儿结了婚。而徐家，据说是明代科学家(《农政全书》、《几何原本》等古代科学典籍的作者)徐光启(1562~1633)的后裔。徐光启是中国最早笃信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他晚年辞官回到家乡上海，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所居住的地区，后来称为“徐家汇”，而且有上海的最大教堂，可能都与徐光启有渊源。倪桂珍生长在这样宗教氛围很浓重的家庭和地区，因而从小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忠实的教徒。因为父亲是学者、教师，母亲的家又是大门第，所以倪桂珍三四岁就开始读私塾，8 岁上小学，14 岁进入教会办的西门培文女子高等学堂，17 岁毕业后即留校担任教员。